

酷兒全球化 / 女性情慾烏托邦

貓兒嚙聲的媽媽國：

《她鄉》的白種女性禁慾想像

丁乃非原著

劉人鵬譯

所有我們的女人犧牲奉獻給她們個人的家庭的，這些女人都奉獻給了她們的國家與種族，所有那些男人期待於女人的忠心與服務，她們不是僅僅給予男人，而是彼此互相給予。（夏綠蒂·柏金斯·吉爾曼，《她鄉》，頁167）¹

這篇屬性不明確的文章，完成於1997年10月。當時，女書店負責人好幾個月前邀約我寫一篇介紹〈黃色壁紙〉和《她鄉》的文字，為女書店即將出版的《她鄉》作序。我那時看的是原文的（她鄉），立即覺得有必要在序文中提出這篇小說在我讀來，一片女性建國的異象中驚心的文化、種族、性的階級偏見及歷史烙印。也就是說，女性建國的「女性」到底是依何時何地哪些社會、經濟、種族、性慾望條件的性別想像而來，非常重要。尤其是身處當時台北的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的氛圍。小說的偏見處處驗證了台北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當時的一些結構和歷史盲點。在小說中，這種偏見可以見諸敘事結構、情節佈局，也存在於小說敘事的留白與字裡行間。而

¹ 本文閱讀分析，引自小說原文（*Herland and Selected Stories by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ed. Barbara H. Solomon, New York: Signet, 1992），翻譯則引自女書店出版的忠義本（《她鄉》，夏綠蒂·柏金斯·吉爾曼作，林淑琴譯，台北：女書，1998）。

台北國家女性主義 / 婦運的論述偏見，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做了初步的分析。²在被邀約寫序的當時，只覺得必須將《她鄉》的宏觀異象與台灣現實環節中女性主義陣營和論述的轉型發展連結起來閱讀。因為，女書店在那時，以《她鄉》作為書的首篇，又是書的名稱而計畫出版，我以為具有女性主義、性別政治的意涵。這種意涵可能的未來路徑，正如小說的異象一樣，應當可以在序中闡述，作為出版中譯本較為脈絡化的、（自我）批判性的閱讀。遺憾的是，交稿後，電話告知這篇文章不適合作序。後來，這篇文章連同白瑞梅（Amie Parry）對於《她鄉》的酷異變奏，一起在 1997 年 12 月中央大學性 / 別研究室、清華兩性與社會研究室、桃社合辦的超薄型研討會中發表，並由劉亮雅和朱偉誠回應。1998 年 5 月，本文以書評的面貌，刊登於《當代》第 129 期（1998/5/1）。為重現去年超薄型研討會的原貌，這次性 / 別研究期刊決定將兩篇論文加兩篇評論一起刊登。本文的更動主要在增加了註腳和書目。³

² 亦可參見《當代》第 127 期，1998/3/1，〈「婦女新知」家變事件〉。

³ 本文得以完成，過程中的許多討論和資料，特別感謝劉人鵬和白瑞梅。1997 年 12 月 20 日，性/別政治超薄型研討會【女性烏托邦的性別政治】中，劉亮雅的評論以及在場許多朋友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本文讀法提出的部份問題和論點，寫成後得知，在 1993 年張惠娟的專題論文〈典範興替——論吉爾曼的《她之鄉》〉（第三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選集：文學篇，單德興主編，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3，205-207。）張小虹所作的評論中已經提出近似觀點：「如果女性主義的一貫立場乃是反霸權、反父權、反宰制、反壟斷，那女性主義閱讀似乎必須具備自我解構與自我顛覆的能力；如果經典的概念必引發一連串包含 / 排除之過程，那我們就必須回過頭來想一想《她之鄉》作為經典或對抗經典時所壓抑與排除的異己。……此外，還可質疑吉爾曼再對性別與階級的關注的同時，是否也壓抑了其作品中其他少數團體——如猶太人、黑人及移民——的權力？」。

夏綠蒂·柏金斯·吉爾曼的中篇小說《她鄉》(1915)，以及她早期更著名的短篇故事〈黃色壁紙〉(1892)於1997年秋天在台北的翻譯及1998年春的出版，對於台灣在地的婦女運動以及女性主義論述來說，是正在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上。二篇作品在本書一塊兒出現，若以它們原初寫作的時間順序來閱讀(而不是以它們在本書翻譯中的次序)，吉爾曼在美國世紀之交所寫的這兩個故事，可以看成一則寓言，寫的是異性戀父權婚姻機制如何是個去烏托邦(dystopia)，逼得女人(作為囚禁的家庭/主婦)發瘋，而她鄉卻是個神話式的烏托邦，在那兒男性訪客退化到心理上倚賴與滿足安分的幼兒狀態，結果是女性化或被放逐，而女人則快樂地君臨天下，那是一個達到秩序與美麗顛峰的國度，居住著理性理智的母親，而沒有性的情慾(sex feelings)。

〈黃色壁紙〉是美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夏洛特·珀菁·吉爾曼最著名，並且有人認為是她最好的小說。該文首先出現於1892年，源自作者本身的長期憂鬱症，以及她的醫生所開的「休養治療」處方。〈黃色壁紙〉是對十九世紀英裔美人中產家庭女人被派定之角色的一個有力的控訴。敘事者嫁給一位溫良和善的醫生，她是一位作家，為「神經質的焦慮」所苦，而她的哥哥(也是一位醫生)以及丈夫二人雙雙決定，她必須用一個夏天離群索居，俾便儘量「休息」，尤有甚者，「絕對禁止工作」，直到完全康復為止。她被迫住在頂樓的育嬰室裏，那兒窗子裝了護欄，壁紙破了，地板刮痕累累，床釘死在地上。她在他丈夫與小姑恆常的「善意」監護之下，等於是被軟禁了。當他們看不到的時候，她就寫作，但又漸覺得累。同時，破了的黃壁紙卻是愈發引人入勝了，起先顯示了「突然自殺」的怪異形狀，然後，斷頸以及骨碌碌的眼珠子，最後，慢慢地，是那個表層圖案後面的「一種怪異挑釁形狀不明的物體」。作者明白了，這

形狀不明的物體是一個女人，陷於壁紙之下，她一直在爬，晃動了圖案，想要爬出那圖案。

有時候我想那後面有許多女人，有時候只有一個，她爬繞得很快，爬得整個圖案都在搖晃。……

她無時無刻都想爬穿出來，但是任誰也爬不出那圖案——纏絞得很緊。我想就是這樣，它才有那麼多的頭。（頁 271）

最後，她決定要幫助壁紙裏的女人，開始和她一起在壁紙上又拉又搖，漸漸她自己成了壁紙裏的女人。故事的結尾我們看見她滿屋子爬行，把自己鎖在裏面，將鑰匙丟出窗外。她的丈夫進來，發現她神經質焦慮的妻子沒有被治好，反倒瘋了，錯愕得暈倒。

吉爾曼的敘事體所控訴的，不僅是她自己被指定的休養療法，而是婚姻與家庭機制，以及大多數她那個社會階級的女人所被期待的被馴服於家庭內的妻母角色。（婚姻 / 家庭）模子如此纏人，深陷其中的女人總想往外爬，然而就在爬的過程中，又被糾纏，張著骨碌碌的眼睛斷了頭。或者，當她們最後終於成功衝破壁紙，付出的代價卻是清醒與自由，而就像那敘事者，她們只能動物般地在一間向來慣於侷限她們的幼兒房裏爬來爬去。在這美國上個世紀之交的一個女性作家的故事裏，女性不滿異性戀婚姻與布爾喬亞把女性馴服於家庭內，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瘋掉。

如果說，〈黃色壁紙〉是吉爾曼在世紀之交的美國中產階級婚姻以及把人馴服在家裏的氛圍裏，對於女人的歇斯底里困境之早期去烏托邦看法，那麼，《她鄉》也許可以讀成是吉爾曼對於同樣這一個（美國）「家馴主義」（domesticity）的烏托邦看法，只不過範圍擴及整個國家，清除了所有男性的存在與影響，像個共產家庭般地運作，只住著高度文化文明的，極端理性與良善的，母親與女兒。

《她鄉》的敘事者是范戴克·簡寧斯，一個美國男人，和他的二位男性朋友到一個莫名的國度，「是到一條大河的千百條支流和碩大的腹地去，地圖需要重新描繪，野蠻的方言需要研究，可以預期各種奇花異草和珍禽走獸。」這次探險帶來了驚人的發現：一個女人國，她鄉。三個男人發現他們彬彬有禮地變成了這個國家「公共保護的對象」及居民，而當他們被迫停留期間，他們學習她鄉的語言與歷史，試圖逃走，但又被帶了回來，與三個她鄉的女孩發生「性一愛」，結了婚，最後還是離開了她鄉，因為泰利·歐·尼可森（老尼克）的性侵犯而被驅逐出境，泰利是三個男人中最屬刻板印象中大男人氣的性別歧視者，而在性方面具侵略性的。

敘事者說故事的觀點是，男人以及所謂的二十世紀初的美國人，對比於一個「去家庭化」的女人之地，或許是有意要被寫來挖苦的，而那個女人國的所有女人，對三個美國男人來說，幾乎不被認成是「像女人的」女人，在這些男人的眼中，她們似乎頗不具女孩子氣。讀者被預設為與這些美國男人持同樣的女人觀與對「女人」的期待：女人應當如何穿著，如何舉止，以及她們對男人、工作、小孩與國家的感覺。三個各自不同的男人形成一個光譜，代表在「我們的」世界裏男人對女人可能的三種不同的態度：泰利是性歧視的「色狼」，傑夫（馬格瑞夫）是超一紳士，把女人偶像化，崇拜女人，而敘事者范戴克，他（很幸福地）居於中間，他「從來不太在意女人」，而在她鄉，他卻被認為是最具魅力的，因為他「像」她鄉的女人（『我們最喜歡你，』索瑪告訴我，『因為你比較像我們。』）

范戴克的敘事是用來引介吉爾曼的批評的，她批判了 1910 年代美國所理解的女性氣質與將人馴化於家內的氛圍。因此，在范戴克多處反省此地「女人」與家鄉的「女人」之不同的段落裏，其中有

一處說到：

這些女人非比尋常的母職觀念統御著整個文化，就我們所謂的「女性特質」則是匱乏得驚人。這立刻叫我想到了我們堅信深愛的「女性魅力」根本不女性，而只是反應男性特質——為了取悅我們而發展的，因為她們不得不取悅我們，但對她們真正自我實現的偉大過程並非必要的。（頁 109）

而在一次論及為何在她鄉沒有家姓的談話裏，

「都沒有姓嗎？」泰利一臉倨傲的問下去。「沒有家姓嗎？」

「沒有啊，」她（毛黛）說。「為什麼要？我們都是從同一根源來的——實際上都是一個『家族』啊！我們頗為簡短、有限的歷史起碼給了我們這點好處。」〔……〕每個人都可以正確追溯到第一位親愛的首母身上……但每個人知道哪個孩子是哪個母親的——何必呢？」（頁 135）

范戴克發現，女性氣質與女人味都不是天生自然的，因為那其實是「男人製造」的，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產物，他們的女人以女性氣質之名而有的特性，其實卻是「男性氣質」。這當然是二十世紀女性主義早期最強的論點之一，就是說，性別是社會與文化建構的，而不是天生自然的，性別刻板印象禁錮並侷限為生物性別與各種性慾的再現。然而，范戴克的觀點，以及她鄉的女性主義，她同樣背負著時空脈絡的限制，1910 年代（時間）的美國（空間），它們是在彼時彼地被製造的。因此，只是宣稱女性氣質是「男人製造」的，而不進一步陳明說，並非有個「男人」在背後製造，因為「男性氣質」是個不斷演進的建構，其意義與效應隨著可敘說的歷史過程而變動，若不說明這一點，而僅止是說女性氣質為男性所製造，那就是再次具現了生物性別先於社會性別（再現）。當這篇小說極力將一片好女人與強女人的土地（「強健之民」）完美化時，事實上獲致的效果卻是具現一個美好的，起源為女性的「媽媽—性別」，這個國家

社會是一個打理得完好無缺的家（或一個公園，一座花園）的縮影，立基於單性生殖的單一理性，「處女所生」，亦即，是一個女性種族的無性繁衍。而這也就是她們沒有姓氏的理由。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全國都始於首母，不會與其他較低等的種族或品類有異種交配的情況，唯有嚴格的自我控制與自我管理，俾便對質與量都作有效的掌控。

這裏「質」所指謂何？有幾點，其一，這個女人國的女人，都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女人，維繫著可以想見的最高標準的乾淨與秩序，而這回不僅在家庭的層次，而更及於國。「沒有塵土」、「沒有煙」、「沒有噪音」，「每件事物都美麗，井然有序，乾淨俐落，還有家最令人溫馨的感覺漂浮於上。」但這個「家」卻不是任何一家：因為在世紀之交的美國，一定有各式各樣不同收入，不同人種的家。不，這個國度及其子民，在初識之時，顯然令敘事者范戴克憶起某種感覺，「在回憶裏一直往回追溯，終於找到了。」

小時候經常卡在絕望的錯誤裏，尤其在我短小的雙腿使盡力氣奔馳，卻仍然無法克服上學遲到的時候。……傑夫也感覺到了，我看得出來。我們覺得像小男孩，非常小的男孩，在和藹的女士（gracious lady's）家裏淘氣被抓到。（頁 46）

對三個訪客中的二位來說（這二位是最相信她鄉的獨特氣質，而最後又被同化的），她鄉令他們憶起「優雅女士的家」，在那兒訪客立即變成小孩因淘氣被抓到。他們被抓到了，但沒有被處罰，只是被施以再教育，而且至少對這二位來說，是成功地被再教育了。唯一沒被革新的是泰利，那他就必須被趕出家門，趕出國門。重點是，這是個「優雅女士」的家，一個擁有資產（中產階級）與教養（文化資本，「文明的」）的女人——顯然是本世紀之交美國人想像中與社經地位上的資產與教養。因此，「她們的國家和荷蘭廚房一樣

整潔」而道路「每個彎弧、曲度、溝渠都完美的和歐洲最好的一樣」。這裏比較所用的語彙，不僅只是敘事者知識與意識視域的函數，而是，這個敘事體本身，小心翼翼地記載著她鄉與其種族發源地歐洲「最好的」相似之處。

她鄉源於二千年前，至少，對范戴克來說，「我（范戴克）毫不懷疑她們是雅利安種（Aryan）的，一度曾經接觸舊世界最傑出的文明。她們是『白種的』，但因為長年暴露在太陽下和風雨中，比我們的北方種族稍微黝黑些。」之所以需要對額外的黝黑作說明，說那黝黑並非由於種族，而斷然是環境因素，透露出這篇小說參與了世紀之交英裔美人種族與殖民論述。⁴她鄉批判了美國在社會性別上是男人製造的世界，卻隱然同意同樣一個世界裏的種族與社經秩序，並且與之共謀。因此，環繞她鄉周圍的野蠻部落，當然是「低等的」種族與文明，要與之保持安全距離。她們知道「下面那些朦朧的林子裏住的野蠻人，」同時也知道「其他區域文明存在與發展。」而當三位訪客初次到臨時，「她們立刻接受（那雙翼飛機）是其他地方高度文明的證明。」那麼，偶爾闖進的更「野蠻」血統的訪客將會如何？小說裏沒有明說，只是讓我們猜測他們「消失」的方式。因為照起初帶領范戴克一行人的嚮導的說法，那些冒險去到這片女人地的人從來沒有回來說過。當然，范戴克不一樣，他有高等的「血

⁴ Elizabeth Ammons 曾引 Susan S. Lanser ("Feminist Criticism, '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r in America," *Feminist Studies* 15, Fall 1989, 415-41)的文章，說明對於〈黃色壁紙〉的女性主義閱讀，其實奠基在民族、階級但最重要的是種族的盲點之上。Lanser 認為〈黃色壁紙〉體現了當時吉爾曼和美國白種中產男女人士共有的（華裔）種族歧視，這份歧視就烙印在小說通篇的「恐怖黃色（壁紙）」上。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39-40.)

統」與文明。因而也就享有他特有的溫馨接待與其後的「教育」。

不止是「低等」訪客的消失引起我們好奇，關於人口方面的「品質」、思考方式、生活模式、「全體一致無異議」的維護，究竟如何？「她們擁有最平和的脾氣，最完美的耐心和好性情——最令人讚賞的是她們根本不會惱怒發火。」有個線索隱藏在對貓的管理裏。就是說，很奇怪，或者說是可以預料得到的，（端看一個人是否來自這樣一種文化與時間、空間：會由一種特定的動物聯想到一種特定的性別，）這竟是一塊只有貓而沒有狗的地方，「國家內沒有野獸，連被馴服的也很少。」

你們猜猜這些奇女子把貓弄成什麼樣子了？經過漫長和謹慎的選擇與淘汰，她們培育了一種不會大聲叫（sing）的貓！這是事實。這些可憐的笨獸肚子餓或要開門時，只能發出一種唧唧叫的聲音或呼嚕聲，還有對幼貓發出各種母性的聲音。⁵
（頁 9415）

一個類似的辦法是用在她們自身的繁衍上，一種對於合宜的媽媽種的名副其實的培養。當處女要生五個女兒，個個女兒將又成為五個女兒的母親，這狀況將導致這個小小的花園國有人口過剩的威脅時，將會如何？她們將如何控制她們自己的生殖？而維護產品一致的品質？

……她們一起坐下來諮商，想出解決之道。她們是腦筋非常清楚，非常聰明的思想家。她們說：「經過我們最大的努力，我們的國家只能扶養這麼多人，這種水準的和平舒適健康美麗和我們要求的進步，很好，我們就生這麼多人。」

就是如此，她們都是母親，但不像我們的受孕是無助的，不

⁵ 原文中的"sing"由上下文看似乎影射貓類所有較「粗鄙」、「獸性」的發聲，包括春叫。

是出於自願的，被迫填滿，甚或過分充斥在土地上——每一片土地！然後看著她們的孩子受苦犯罪，隨之死亡，恐怖的和別人爭鬥。但在有志做人的製造者腦海裏……她們是在做人——她們做得的確很好。

接著是一段「淘汰優生學」的時期，這一定是駭人的犧牲。我們一般都願意為國家「奉獻我們的生命」，但是她們必須為國家棄絕母職——這的確是她們最難做到的事。（頁 12415）

如果生殖真有可能透過控制「內心深處強烈要求孩子」的自我犧牲而維護，這種維護與生產的品管就更困難而需要迂曲委婉的解釋。

然後她們開始涉足改進口質——既然她們的數量已經受到限制。這項工作已經持續不斷的進行了一千五百年。你還奇怪為什麼她們是好人嗎？

生理學、健康學、衛生學、運動養成——這些工作早就完備，她們幾乎全然不知疾病為何物……她們很乾淨，活力十足，一直擁有最佳的照顧和完美的生活條件。（頁 129）

那麼那些不是完美的「養得乾乾淨淨」「活力十足」的人，或者，像泰利所說的，「我們不知道她們如何處置罪犯、有缺陷的人、老年人。」很簡單，正如索瑪告訴范戴克的：

「當我們開始——即使從那特殊高貴的母親開始——我們繼承了她背後漫長的種族記錄，牠們不時蹦出來——夠嚇人的。但這——沒錯，已經快六百年了，我們沒有你們所謂的『罪犯』。」

「當然我們的首要之務就是利用訓練和一種把最低等的類型排除。」

「育種排除？」我問。「怎麼可能？——妳們都是自體繁殖。」

「如果女孩子表現出不好的質性，但仍然願意分擔社會責任，我們就請求她放棄母職。幸運的是，有些最壞的典型無

法生育。但如果缺失是不成比例的自大性格——這女孩顯然知道她有權利生育，即使如此，她的孩子還是比她的好。」⁶

「我懂了，」我說。「然後她可能會以同樣的精神教養她們。」

「我們向來不准如此，」索瑪安靜地回答。⁷（頁 14516）

《她鄉》寫作與出版的 1910 年代，這種不讓她鄉「最低級」的子民育種的論述，這種對於「壞品質」的女孩訴諸「社會責任，」使得她自我犧牲以抑制生殖，帶走那些太具自我權利意識（「不成比例的自大性格」）者的小孩，使得那些小孩不致於複製她脫軌的母親「不成比例的自大性格。」這裏的邏輯，與稍後的 1920 年代興起的法西斯主義邏輯，一模一樣，乾淨、秩序、文明的歐洲她鄉，就是這麼提醒了她的訪客們。也正是這同樣的邏輯，驅使美國與澳洲晚至 1940 與 1950 年代實施的社會福利政策，奪走窮人（在美國是如此）與原住民（澳洲）的小孩。次等落後的階級與種族的繁衍必須積極被阻止，以保證一貫的品質，人民整體「一致無異議。」

最讓人困惑的，也是意義最不祥的，就是《她鄉》裏將種族倫

⁶ "Some of the worst types were, fortunately, unable to reproduce. But if the fault was in a disproportionate egotism -- then the girl was sure she had the right to have children, even that hers would be better than others." 「這女孩顯然知道她有權利生育，甚至她以為自己的小孩比她人的好。」又，凡引文畫線處為本文作者所強調者。

⁷ 這一段對話中的「含蓄政治」非常清晰，尤其是索瑪最後安靜簡短的回答："That we never allowed"——「向來不准如此」中的「向來」和「不准」銘刻著長期安靜的言辭禁忌和對於不符合標準美德的女孩的心裡身體規訓。其中象徵暴力和心裡強制讓人想起吉爾曼在〈黃色壁紙〉中，對於父權家訓主義的控訴。這個父權家訓主義也充滿了含蓄的，隱藏在醫學權威中的暴力效應。至於「含蓄政治」，請參見本書中劉人鵬、丁乃非的〈罔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

理與性別化的生物性接合起來。生育控制意在達成女性種族的純淨與良善，而在少數失敗的例子裏（「不成比例的自大性格」），國家的教育要革新她的小孩，方法是將小孩從她那在倫理的—生物性上有瑕疵的媽媽身邊帶走。

《她鄉》可說是一個例子，範示的是，以單一的性別差異為基礎，從「我們的」性別情況（1910年代的白種美國）去想像，發現並同化於一個較高級的「異類」（國家），這種敘事的侷限性。這個「異類」只是倒轉了「我們的」性別邏輯的價值與景況，然而卻複製了「我們的」（白種美國的）社會裏幾乎所有其他不平等的權力協調機制。她鄉因而被想像成一個純粹白種人的國家，居住著「強健之民」，而她們恰好都是女人。單一性別其實只是她們歷史的僥倖，具現為一種宗教，民族精神與律法。除了一點之外，這個國家對於二千年後的第一批男性訪客來說，完全是他們認得出來的。這是一個乾淨、治理得當、教養得好的一個公園，一座花園，一個公社，全是女人，而不是白種人中產階級「優雅女士」的領域與天堂。

吉爾曼在世紀之初對於一個女人國烏托邦的異象，是一個以種階級為本的社會秩序意識型態，這個特點在那相傳的起源，她鄉所謂的「性—情感」之幾乎不存在，以及社會—生物性的所謂隔代遺傳（atavism）上，最為清晰。

不但無法利用異性相吸的感覺，這種概念根本不存在。因為二千年來廢除使用，所以留下極少的直覺。但我們必須記住即使有些人擁有這個隔代遺傳的特例，還是往往被剝奪母職。（頁162）

女人作為母親與女兒，她們只是姐妹與朋友。就像她鄉的貓兒，女人不「唱歌，」她們不自慰，她們沒有性，她們不會慾望彼此，或

者慾望任何「異類。」當三個「文明」的白種男人終於出現在她鄉，她們只認為是「面對一個機會，可以跨越大步，改變整個情勢，逆轉回到早期自然的雙性社會秩序。」

事實上，她鄉的「歷史」起源是階級、種族衝突與爭戰，表現在性別上，也由性別而解決。她鄉原來與別的任何國家沒有兩樣（在西方文明的記憶中），有船隻，貿易，軍隊，國王，和鄰國（野蠻人？）的一連串戰爭之後，迫使她們來到現今佔有的一小塊區域。她們開始了多夫妻制，「雙性的」雅利安種族，擁有奴隸，「像那個時代其他的民族一樣，」但是，當（與他族的）戰爭與火山爆發截斷了她們通往大海與外界「文明」世界的唯一出路，

除了奴隸，非常少數的男人存活下來。這些奴隸伺機群起叛變，殺害僅存的主人，連小男孩也不例外，也殺害老婦人和母親，意圖霸佔所剩的年輕女人和小女孩。

但這一連串的災禍對這些忿恨的處女太難以承受，她們人數很多，但這些可能成為日後的主人翁的奴隸為數很少，所以年輕的女人沒有屈從就範，迫於絕望殺死了征服她們的人。……

當時真的除了一堆歇斯底里的女孩子和一些年紀較大的奴婦，這片美麗的高地花園沒有人存留下來。

這大約是二千年前。（頁 10314）

重要的是，這樣一則「起源故事」所回憶的，是十八世紀美國移民中奴隸擁有者以及他們的女人與妻子的恐懼與幻想。這些恐懼特別是對於異族通婚的恐懼，對於奴工階級反抗的恐懼，以及奴工階級對於他們主人的女人們之性侵略的恐懼。因此，一場二個階級之間的戰爭，在隱喻上變成二個性別之間的戰爭，連帶的是一些「忿怒的處女」與一些跟班的奴隸女所建立的國度，低等從屬的階級終於

被化約，並且也被記憶成是那低等的「性，」也就是具有所謂隔代遺傳性（*atavistic*）的「性—情感」（*sex feelings*）。這種低等階級淪為性（兼指社會性別與性慾）的傾頹，在三個種族上與階級上都屬高等的男人蒞臨時，面臨了改變。用范戴克的話說，她鄉的女子知道三個「探險家」到臨時，她們腦中所想的是：

來自另一國度，可能是男人，顯然高度文明，無疑擁有非常寶貴的知識。或許危險。儘可能抓住他們，如果需要就馴服或訓練他們。這可能是我們國人重新建立雙性社會的機會。

這個例子裏的馴服與訓練完全沒有根除這三個雄貓想要「唱歌」的慾望。因此，這三個男人全都向他們所選擇的女孩表白了，表達了無法理解的，其實是不必要的與「不自然的」慾望。

對她們而言，長久以來，母職一個高尚的目的就是掌握生活的法則，而父親的貢獻無疑也應該是為了達到同一目標的另一個方法。她們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男性動物的慾望往往漠視親職，追求的只是我們美其名的「愛之喜悅。」（頁 234）

在她鄉，性慾完完全全歸於生殖，並且沒有了生物性的生殖，性慾就根本不存在。對女人來說，那是一種生物性的「內在驅力，」理想上與實際上都透過孕育生殖而完全得到滿足。（在某一點上，依拉朵懷疑地問范戴克，「你是說……你們的人結婚後，不管是不是季節，馬上就做起來了，根本沒想到小孩嗎？」）然而只有在男人才有一種未與生物性生殖相連的性慾望。這是一種隔代遺傳的特質（*atavistic trace*），長久以前來表現在她鄉（低等的）女人身上。這種女人，就像艾黎蒙（泰利的「配偶」）所擁有的，依范戴克的說法，就是「隔代遺傳比較突出的女性特質，一直隱藏未現」，如果顯明了，她們「往往就會因這種特質而被剝奪母職。」在《她鄉》中，性慾因而是生物性別（男性，女性）的一種原始的特質，最好透過一個漫長的生

物控制過程將它拔除。⁸

但是，有一種男性的性慾望是被接受的，那就是范戴克對依拉朵的。依拉朵來自長遠的超母親（這正是納粹德國所用的詞）家世，是「高等的。」她沒有洩露任何隔代遺傳的跡象，相反地，透過長期的交談，她能夠對范戴克造成一種昇華的轉變的影響，直到他發現他對她的性慾變成了他所謂的「往上昇華，非常的崇高，不是往下墮落。」

我發現往上昇華的愛終究是絕佳的感受。給我一種奇特（queer）的感覺，深刻入裏，彷彿攪動史前古老隱晦的意識，一種絕對是對的感覺——認為這才是感受的方式。就像——回到母親身旁。……我指的是一個走失很久的幼兒會有的感覺。是一種回家的感覺，能夠乾淨的休息，安全不失自由，永遠有愛圍繞，宛如五月的陽光溫暖，不似火爐或羽毛被燙熱。一種不會令人心煩，不會令人窒息的愛。（頁 240）

男（異性）戀慾望昇華為一種退化 / 亂倫的對於母親的愛與溫馨的慾望：她鄉竟如此想像一個未來可能的「回歸」於「自然的雙性秩序」。（至於這類想像中的酷異變奏，請參本書中白瑞梅〈從他鄉到酷兒鄉：女性主義烏托邦渴求之同性情慾流動〉）

1997 年初，二位女人死於暴力，一位長期參與婦女運動與反對政治，另一位則是一個單親媽媽的女兒，後者的母親是全國知名歌星與演員，據說也是台灣總統的最愛，激起了全國性的對於女人與

⁸ 「性相 (sexuality)，是吉爾曼對於父權的終極想像。」「當吉爾曼在她鄉中剷除了性別差異，吉爾曼卻延續了對於性的高度壓制的想像看法，甚而宣稱馴伏了性相，才使她鄉的女性得以建一個她們設計的國。」 Jean Pfaelzer (*The Utopian Novel in America, 1886-1896: The Politics of Form*, 156-157)。性相作為 sexuality 的翻譯，來自朱偉誠〈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1998 年 6 月，55 頁。

小孩安全的支持。這項支持，以及一連串的抗議遊行，激勵了台灣都會中心大多數的人口。婦女與小孩的日常人身安全，從這二個被強暴與被虐待的女人身上表現出來，獲致一種普遍的神話性的價值。台灣中產階級都市社會達到某種共識，似乎也為在地的女性主義者與婦女運動長期奮戰的議題背書了。某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國家終於覺醒了，知道她在公共安全議題上缺乏性別意識，從今將可以在地方及國家的層次上，開始啟動性別平等政策，以彌補過去的不足。從這個觀點看，連結女性主義與國家的時刻已經到臨。似乎很清楚的是至少在這個議題上，女性主義將可獲得中產階級都會人口的支持。

當鬆散地構成台北以及台灣其他各處的婦女運動的不同婦女團體之內與之間開始討論，關於國家與女性主義之間的新的聯結，其間各種的矛盾衝突與策略時，台北市長與市議會的反色情政策，涉足制定了一個象徵性的暴力，暴力對象是 129 位公娼，她們在台北市領有工作執照，受合法保障。一夕之間，她們都變成「非法的」了，這些性工作者，大部分是文盲的單親媽媽，平均年齡四十歲，獨立撫養小孩，有些甚至要撫養家庭。為了限制社會福利金的取得資格，補償津貼給予的形式是懲罰性的監護，以及強迫性的循規蹈矩。這些性工作者組成了自救會，並且走上街頭抗議，她們蒙面，作為社會對她們工作污名化的一個可見的表徵。對於這項政策，使得她們的生計成為不合法，甚至更危險，較前更不能在身體與經濟的蹂躪上受到保障（因為這些大多數是文盲的婦女，有些無可避免的仍得要繼續從事性工作，就算不合法，仍得要），她們的要求是兩年的緩衝期。她們的訴求主要一直為婦女工作團體所支持，然而那些自 1997 年初抗議行動以來，已被視為主流的台灣婦運團體，卻是一直保持噤聲沈默，某些場合宣稱她們不確定，感到困惑，或者

就只是一味地堅稱（不反娼但是更）反性產業。

雖然這個議題正也是關乎女人在公共領域的人身安全與福利的。但這一次，要求對自己的身體、人格以及工作要有法律認可之保障的這些女人，她們的工作涉及性服務的交易，就被認為在 *性別* 上造成問題與疑慮。包含了（女）性性的身體部位的交易與服務的工作，在這種觀點之下，被認為是反—女性，或者是反—女性主義者的。這裏的含義似乎是，女性生殖的身體部位，必須保留給私人使用、交換與流通，它們不能進入公共交換領域，也不能變成一般貨幣經濟的一部份。沒有問到的問題卻是，相對於國家機器與公共領域，究竟要在哪裏，或者如何，定位家庭、女性的性相、以及「家馴主義」。其實，女性的生殖部位難道沒有在婚姻與家庭的脈絡裏被交換、買賣、管理，並且變成專有的財產？女性主義者與婦女團體說，女性的性與生殖，不能只是私領域的事，強暴、性侵犯、婚姻暴力與離婚都必須成為公共議題與法律事件，然而，同樣的婦女團體，在娼妓女人的性以及生殖上，卻主張仍必須保留為準—神聖的私人領域，（公娼不能結婚），保留為法定的異性戀繁殖目的，不能付諸公共討論、使用與交換，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貨幣經濟卻又無所不在了，我們該如何了解這現象？

《她鄉》其實提供了一個解答的線索。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女人的性與生殖器官才必須盡一切代價加以保障與護衛，那就是，合乎一種特定的可以被接受的關於女人的定義（她配稱為這樣一種性別。）因此，在《她鄉》裏，那些不合於她鄉的女人味、母職與女孩兒氣之理想的女人，就被認為不能作為社會與生物性繁殖的候選人。而在台灣，當國家機器與女性主義開始要接觸並且結盟的時刻，在色情與娼妓等具爆烈性與分歧性的議題上，我們發現，一種

關於「女人」的論述與定義出現了，那顯然是基於階級的，而且是性化與性別化的合乎階級價值。回想一下《她鄉》中不唱歌的貓，性慾在反色情論述中，簡直就是一種男性（異性戀）的特質，而擁有此特質的女人就有與敵人共枕之嫌。女人在這樣一個危險而暴力的父權時代最好不要唱歌，同一邏輯又出現了。或者，她們應該以一種全然難以想像的，認不出來的，而且，最好是完全沈默的方式唱歌。否則，一個人就很難分辨出到底是男人在唱或是女人在唱。然而，對於靠唱歌維生的女人來說，她們怎麼辦？還有，那些獨自唱歌，但喜歡把它說出來的女人？或者，和女人一起唱歌的女人？和男人一起唱歌的男人？這些問題，就像在她鄉一般，被認為是比較不重要的。這些問題比很多事情都不重要，比方說，母職，育兒，住宅附近以及國家的清潔與秩序，一般社會的彬彬有禮等。

正是這種價值的等級本身，是需要被質疑的，而在《她鄉》中，這反應為它的時代、空間以及眼界的產物。簡單說，就是 1910 年代《她鄉》的寫作，與 1990 年代台灣婦女團體之間關於娼妓與色情的論戰，其間的種種不同時空的歷史，讓我們得以在她鄉中譯本出現的此刻、此地看見准法西斯主義，更精確地說，是性的法西斯主義——在特定歷史時刻與社會情境下書寫出的自詡為女性主義的烏托邦裏，以性 / 別優位之名，隱含偷渡其階級 / 種族偏見。這也使得我們不得不面對，女性主義論述可能預期並參與在最狹隘的社會與種族再想像中。

而同樣的這種價值等級，複製了羞辱與污名。從事性工作的女人，或者在台灣巨大非正式性工業裏工作的女人，年紀太輕的女人，情慾上愛女人的女人，與女人有性關係的女人，和女人及男人都有性關係的女人，這些女人，都還沒有變成（或者太少會變成）女性

主義論述或是女性主義關心的主體。她們經常是事後才被想到的，或者，更糟的是，施恩式的同情或直接的藐視所看不見的對象，（隱含的意思是，她們應該保持沈默，不要讓人看見。）因此，在 1997 年 9 月 27 日的台北，為刪減教科文預算而走的遊行中，環保團體中的一些女人，大聲苛責走在前面的蒙面的合法的性工作者，「她們以為她們是誰啊，還有臉走上街頭！」

這也是女書店要出版夏洛特·珀菁·吉爾曼的〈黃色壁紙〉以及《她鄉》之中譯本的脈絡之一。而這也是及時出版「黃色壁紙」與「她鄉」中譯本可能的閱讀方式之一。如果以二部作品寫作的時間順序來閱讀，這二個故事寓言了一個可怕的法西斯原型的未來方向，而這正是台灣的所謂國家女性主義向前邁進的未來。對於那些極不同於當前被大家了解與接受的「女人」的女人們來說，尤其是如此。人們忘了，那些當前被了解與接受的女人，她們參與締造了當下被逐漸接受的「女人」的新意義，這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也必然會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衍異。更正面一點說，如果「女人」不要以邁向某一種烏托邦的固定性，以及能指與所指的統一為目標，亦即，拒絕讓偶然性的、由歷史決定與推動的異象，固著於一種社會的性別及性，不允許任何越軌或例外。吉爾曼的兩個故事，必須用來預警那可能發生，但不應該發生的事。唯有如此，「女人」才可能持續是動態的，時有分歧，「身為女人」與「變成女人」的意義與情況永遠在矛盾地轉變與擴展，至於轉變與擴展的程度與樣態，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從此時此地，這些在歷史上與時間上被性別化了與性化了的身體上，預作確認。因為，

……假如我們僅只是以為，社會性別的區分是人類認同的根本，那我們既不能了解社會性別區分的全概性的權力作用，也不能明白，這樣一種權力作用無可避免會服務的真實利

益。⁹

參考書目

- 朱偉誠。〈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1998年6月。
- 張惠娟。（典範興替——論吉爾曼的《她之鄉》）第三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選集：文學篇。單德興主編，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3，205-207。
- Ammons, Elizabeth.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Armstrong, Nancy.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Barr, Marleen S., editor. *Future Females: A Critical Anthology*.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Bartkowski, Frances. *Feminist Utopias*.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Herland and Selected Stories by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New York: Penguin, 1992.
-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Herlan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9.
- Pfaelzer, Jean. *The Utopian Novel in America, 1886-1896: The Politics of For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4.

⁹ 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